

外宣政治文本中“粮食安全”话语的文化表征与英译策略

钟洁玲

湖南农业大学

DOI:10.32629/er.v9i7.7264

[摘要] “粮食安全”是中国外宣政治文本中的重要议题，其英译不仅关系政策信息的准确传递，也关系到国家形象、治理理念与价值立场的对外表达。本研究以《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及相关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本为主要语料，运用文本对比分析方法，考察“粮食安全”话语在词汇、句法和修辞层面的语言特征，比如政策术语密集、四字结构凝练、隐喻与互文表达突出、句法重意合等特点。研究指出，该话语体系折射出中国农耕文明与民本思想的历时性传承、高语境文化下的“意合”思维以及新时代大国治理的制度叙事三个维度分析其文化表征。基于此，译者应视表达类型灵活调动翻译策略：以直译与释译显化应对权威专业术语，以词性转译与句法整合重构四字格节奏，以意象保留、替换或去隐喻化策略处理特色隐喻，以主语增补与逻辑显化化解流水句句法差异，以省译动词与合译并列项消解排比重复结构的冗余，并通过阐释性意译与文化补偿传递典故俗语的深层内涵。本研究揭示了“粮食安全”话语的文化表征与外宣翻译策略间的内在关系，为提升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实践启示。

[关键词] 粮食安全；外宣政治文本；文化表征；英译策略；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Food Security" Discourse in Political Texts for External Publicity

Jieling Zhong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Food security" is a core topic in China's political texts for external publicity.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concerns not only the accurate delivery of policy information, but als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image, governance philosophy and value positions. Taking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white paper China's Food Security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as the main corpus,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text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food security" discourse at the lexical, syntactic and rhetorical levels, including dense policy terms, concise four-character structures, prominent metaphors and intertextual expressions, and parataxis-oriented syntax.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scourse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diachronic inheritan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people-oriented thought, the parataxis thinking under high-context culture, and the institutional narrative of major countr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On this basis, translators should flexibly adopt targeted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expression types: use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explicative paraphrase for authoritative professional terms, reconstruct the rhythm of four-character structures through part-of-speech conversion and syntactic integration, handle characteristic metaphors with image retention, replacement or de-metaphorization, resolve syntactic differences of run-on sentences through subject supplementation and logical explicitation, eliminate redundancy of parallel repetitive structures through verb omission and combined translation of parallel items, and convey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allusions and proverbs through interpretive free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ompens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food security" discourse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external publicity, providing practical insights for improving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of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food security; political texts for external publicity;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引言

在全球安全局势复杂多变的当下,“粮食安全”已超越单一的农业范畴,成为中国外宣政治文本中彰显大国治理与制度自信的核心话语。这一话语体系深植于中国农耕文明与民本思想,在词汇与句法维度上带有高语境文化独有的隐性逻辑与叙事特征。因此,其英译不仅是跨语言的文本转换,更是重构文化意象、精准传达国家政治内涵的跨文化交际实践。本文以《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及相关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文为材料,重点分析其语言特征、文化表征与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这两类文本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代表性和外宣功能。《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集中阐释了中国粮食安全的政策立场、历史成就和治理路径,是研究“粮食安全”话语的重要文本;政府工作报告则连续呈现国家在粮食生产、粮食储备、农业科技和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政策部署,能够体现该话语在国家治理叙事中的延续和发展。二者的英译文直接面向国际受众,适合作为分析外宣政治文本英译策略的典型语料。

外宣政治文本英译一直是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要传递信息,还承担着塑造形象、表明立场的功能。朱义华、张健明确指出,外宣翻译“包含‘对外翻译’与‘对外宣传’两个维度,具有翻译学与传播学双重学科属性”^[1]。这说明外宣翻译的本质已超越单纯的语际转换,译者需从国际传播目的、目标受众接受心理以及跨文化交际效果等角度综合考量。然而,现有研究虽然对外交话语、政府报告和时政术语英译已有较多讨论,但围绕“粮食安全”这一专题展开的英译研究仍比较少,尤其缺乏将语言形式、文化表征与翻译策略放在同一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本文以“粮食安全”为切入点,有助于拓展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议题范围,并为文化表征视角下的政策文本翻译研究提供具体案例支撑。其次,对外政治文本中的“粮食安全”表达往往包含政策术语、四字结构、排比重复、隐喻修辞、典故俗语等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形式。这些形式在英译中如果处理不当,容易造成语义偏差、语气弱化或文化失真。研究其具体英译方法,不仅有助于提升译文的准确性和自然度,也有助于增强中国涉粮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

1 外宣政治文本中“粮食安全”的语言特征

1.1 词汇维度的政治话语特征

词汇层面,“粮食安全”话语首先表现出术语化与权威化特征。白皮书中频繁出现“国家安全”“战略”“保障体系”“产能”“自给”等高概括度词项,并以“口粮绝对安

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等专有名词强化制度确定性。这些术语往往是对复杂政策的高度浓缩,具备极强的“政治性”与“规范性”,旨在确立外宣话语的权威地位。贾文波指出^[2],时政翻译文本具有“表达型”功能特征,作者在文本中的地位是“神圣的”,翻译时应紧扣原文实质,注重措辞的政治含义,避免犯政治性错误。其次,四字格与对偶结构广泛应用,如“稳产保供”“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等,构成了文本独特的音韵节奏和语义张力,提升了政治主张记忆点与传播力。最后,隐喻修辞与互文典故使用频繁。“粮食安全”不仅是宏观数据,更关乎民生福祉。因此,文本常采用隐喻性词汇(如将粮食安全比作“压舱石”,将保障粮食供给称为“保卫战”)以增强语言的具象性与感染力。同时,从互文性视角切入,文本常化用如“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等古典哲理与农耕俗语。这种高文化负载的词汇体系,不仅丰满了政治话语的文化底色,也为跨文化翻译带来了语用等值转换的挑战。

1.2 句法维度的叙事表达特征

句法层面,“粮食安全”话语呈现出汉语典型的意合特征。白皮书常将政策目标、实施路径与结果评价压缩进同一长句之中,通过多个动词短语连续叙事。连淑能指出,汉语造句注重意念连贯,逻辑关系往往隐含于语序和语义链之中,而不依赖显性的连接词;叙述呈动态,倾向于多用动词短语^[3]。一方面,基于隐性逻辑的无主句和流水句是该类文本的核心句法特征。这种无主句和流水句的组合中隐性逻辑也使得句法结构在跨文化转换时,面临着主语缺失与逻辑显化的挑战。另一方面,强化语势的排比与重复结构众多。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句法排列直接服务于其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在“粮食安全”话语中,为了凸显国家保障粮食供给的坚定决心,文本常使用句式相同、结构一致的排比句群。这种多项并列的句法结构,不仅在视觉与听觉上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力,更在语用层面产生了重叠渲染的强化效果,使得政治承诺的语气更加果决、有力。

2 “粮食安全”话语的文化表征分析

2.1 农耕文明与民本思想的历时性传承

“粮食安全”话语首先体现出中国农耕文明长期沉淀与民本思想的历时性延续。在中国语境下,“粮食”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并衍生出中国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民本思想”。《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开篇即提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并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界定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这种表述并非单纯的政策修辞,更体现出当

下的粮食治理与“重农恤民”历史传统的一脉相承。隋斌在梳理中华农耕文明思想理念时指出，中华农耕文明蕴含“农为邦本的重农观、粮安天下的食物观……激发民力的民本观”^[4]。这些核心理念不仅是传统重农观、食物观与民本观的集中体现，更为当下的农业治理叙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以民为本”，其中粮食安全被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关键因素。这一理念在中国传统荒政思想中亦有体现。岳翔宇、夏艳秋指出“维护粮食安全是传统民本政治哲学中的关键，以民为本是贯穿中国传统荒政思想的价值取向”^[5]。因此，外宣政治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口粮绝对安全”“端牢中国饭碗”等表达，一方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谷”“仓”“饭碗”等生存意象的重视，另一方面又把传统民本理念转化为现代国家对人民生存权、发展权和安全感的制度承诺。

2.2 高语境文化下的“意合”思维与隐性逻辑表征

该话语体系体现为高语境文化支配下的“意合”思维。Hall 与 Hall 在论述高语境交际时指出：“高语境交际或高语境信息，是指大部分信息已经存在于交际者自身之中，而只有极少部分信息存在于经过编码、明确表达并被传递的信息之中”^[6]。这一观点说明，在高语境文化中，意义的生成往往依赖文化背景、共享经验和交际双方默认的语境知识，而不完全依靠形式化的语言标记。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汉语更倾向于依靠语序、语义关联和上下文来组织逻辑关系，而英语则更依赖连接词、形式标记和显性结构来实现句际衔接。这一特点在外宣政治文本的“粮食安全”话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等表达，都通过并列、省略和压缩来传递政策原则，其逻辑递进和因果关系需要读者结合中国政策语境加以理解。从文化表征上看，这并不是简单的语言习惯，而是一种以共同体经验为前提的表达方式：国家与人民、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被视为共享知识，因此文本更强调气势、节奏和导向，而较少逐项展开形式逻辑。

2.3 制度自信与大国治理的时代话语表征

第三重文化表征体现为新时代制度自信与大国治理叙事。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已逐步建立起“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并积极参与世界粮食安全治理，把粮食安全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之中。顾忆青、吴赞指出：“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反映国家意志，是一个国家向外部世界系统化陈述其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的言语符号形态总和”^[7]。从国际研究看，“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的学术与政策讨论也已经由单纯的“供给—获取”问题，逐

步扩展到权利、制度与食物系统治理层面，这说明“粮食安全”本身已成为兼具政策性、制度性与治理性的全球议题。因此，中国外宣政治文本中的“粮食安全”话语，并不止于说明“有没有粮”“能不能吃饱”，而是在“国家战略—制度体系—科技支撑—国际责任”的框架中重塑中国叙事：既强调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十四亿多人口的基本盘，也强调以负责任大国身份参与全球粮食治理。

3 基于文化表征的“粮食安全”英译方法与策略

前文已经指出，“粮食安全”话语并不是单纯的农业政策表述，而是由农耕文明、民本思想、高语境表达方式和新时代国家治理叙事共同构成的复合型政治话语。因此，其英译不能停留在词语层面的对应，也不宜简单罗列直译、意译、增译等操作方法。更合理的分析路径应是：文化表征决定话语所承载的意义重点，语言形式是文化表征的外在呈现，翻译策略则是在目标语中重构这些意义重点的手段，最终服务于国际传播中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和形象建构。换言之，“粮食安全”英译需要在“政治意义不失真、文化意象不空转、英语表达不生硬”之间取得平衡。

从政治话语翻译角度看，译者既要维护政策文本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要考虑国际受众对中国制度、历史文化和政策语境的认知差异。Schäffner 指出^[8]，政治文本的意义往往通过翻译进入不同文化环境，翻译因而参与了政治意义的再现与传播。贾文波也强调，时政翻译必须紧扣原文实质，尤其要重视措辞背后的政治含义。基于这一认识，本章将第三章的策略讨论进一步置于“文化表征—语言形式—翻译策略—国际传播效果”的链条之中，分别从政策术语、四字格与对偶结构、隐喻表达、无主句与流水句、排比重复结构以及互文性典故俗语六个方面展开分析。

3.1 政策性术语的权威表述：直译与释译显化

“粮食安全”话语首先表现为高度制度化的政策术语系统。此类术语往往浓缩了国家安全、民生保障、农业治理和国际责任等多重含义，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翻译时若过度意译，容易削弱政治概念的权威性；若机械直译，又可能使目标语读者无法理解其政策内涵。因此，政策性术语的英译应以稳定直译为基础，并在必要处通过释译和显化补足制度语境。这种处理既符合外宣翻译“准确传达中国立场”的要求，也体现了功能对等和政治等效的基本思路：译文不仅要在词义上对应原文，更要在目标语语境中产生接近的政策理解效果。

以《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中的“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为例，英译为“ensuring basic self-sufficiency in grain and absolute security of staple food”。这一译法不是简单的逐词对应，而是在直译和显化之间进行了有意识的平

衡。“谷物基本自给”译为“basic self-sufficiency in grain”，保留了“自给”这一政策关键词，也保留了“基本”所体现的弹性空间，避免把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误解为完全封闭的自给自足。“口粮”没有译为“ration”，而译为“staple food”，则体现了释译显化的必要性。英语中的“ration”容易引出配给、短缺或战时供应的联想，而“staple food”更能传达居民基本主食供给的含义，有助于把中国语境中的民生安全转换为国际受众更容易理解的食物供给安全。

再如“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译为“featuring self-sufficiency based on domestic grain production, guaranteed food production capacity, moderate imports,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原文五个短语具有鲜明的政策口号特征，内部逻辑是“战略原则—资源基础—能力保障—外部补充—技术路径”。如果将“以我为主”直译为“taking ourselves as the mainstay”，译文不仅不符合英语政策文本习惯，还可能造成主体指向不清。现有译文用“self-sufficiency based on domestic grain production”重构了这一表达，把隐含的政策依托显化为“domestic grain production”，从而使“立足国内”不只是抽象立场，而成为具体的生产基础。该译法解决的跨文化问题在于：英语读者不一定熟悉中国政策话语中的压缩表达，显化处理能够帮助其快速把握政策逻辑。

当然，释译显化也有边界。对于“food security”“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food production capacity”等已经在国际组织和政策文本中相对稳定的表达，应优先采用规范译名，以保持术语一致性。若每次都进行长篇解释，反而会削弱政治文本的简洁性和权威感。由此可见，政策术语英译的关键不是在直译和意译之间二选一，而是根据术语的制度负载程度和目标语接受难度，决定是否进行适度显化。直译保证概念稳定，释译弥补文化语境差异，二者共同服务于政治意义的准确传播。

3.2 四字格与对偶结构的节奏感：词性转译与句法整合

四字格和对偶结构是“粮食安全”话语的重要语言形式。前文已分析，这类结构通过凝练、对称和节奏强化政策表达的庄重感与号召力，体现了汉语政治话语重意合、重节奏、重概括的特点。但英语政策文本通常更强调逻辑层级、语法完整和信息展开。如果在英译中强行复制四字格的外在形式，译文容易出现堆砌、僵硬甚至逻辑不清的问题。因此，四字格的翻译不应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对称，而应把汉语的节奏优势转化为英语的逻辑优势。Catford 提出的类别转换理论可以为这一处理提供说明：当源语和目标语的结构体系不一致时，译者需要通过词性转换、语法单位调整和结构重组来实现功能上的接近^[9]。

以“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为例，原文通过两个并列短语形成对偶关系，其中“自给”和“安全”在汉语中既可表现为政策状态，也带有目标导向。译文处理为“ensuring basic self-sufficiency in grain and absolute security of staple food”，将“自给”和“安全”分别名词化为“self-sufficiency”和“security”，并纳入“ensuring”所引导的整体结构之中。这样处理使原文的双重目标在英语中形成清晰的名词短语并列，避免了两个小句并列带来的松散感。可以说，译文牺牲了汉语四字格的音韵整齐，却换来了英语政策文本所需要的结构严谨。

又如“优粮优产、优粮优购、优粮优储、优粮优加、优粮优销”被译为“boost the 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grain, purchase it at higher prices, and prioritize its storage, processing and sales”。原文通过“优粮优一”的连续重复呈现出明显的排比和政策动员色彩，但若逐项直译为“high-quality grain, high-quality production, high-quality purchase, high-quality storage, high-quality processing and high-quality sales”，不仅冗长，而且会误导读者以为每一项都在强调“质量”，而不是强调围绕优质粮食建立全链条支持机制。现有译文将“优粮”处理为“high-quality grain”，再将后续环节整合为生产、收购、储存、加工和销售的政策链条，较好地保留了原文“全链条扶持”的核心意义。

不过，这种整合也意味着部分原文节奏感会被弱化。对于外宣政治文本而言，这种弱化并不一定是缺陷，因为英语读者对重复式节奏的接受度通常低于中文读者。张健关于外宣翻译“变通”策略的论述也提示我们^[10]，译文应服从国际传播效果，而不是机械保留原文形式。因此，四字格和对偶结构的翻译应坚持“意义重心优先、形式节奏适度保留”的原则：当原文结构本身具有可理解的政策层级时，可通过并列短语保留部分节奏；当原文重复主要服务于语势强化时，则应通过词性转译和句法整合压缩冗余，使译文更符合英语政策语体。

3.3 隐喻性表达的修辞与形象：保留意象、替换意象与去隐喻化

“粮食安全”话语中的隐喻表达具有突出的文化表征意义。“饭碗”“压舱石”“命根子”“米袋子”等表达，把抽象的粮食治理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经验、国家稳定和生存基础。这些隐喻不仅增强文本感染力，也连接了中国农耕文明和民本思想。Newmark 指出^[11]，隐喻翻译应根据原语意象在目标语中的可接受程度选择不同策略：若意象可以被目标语读者理解，可保留；若文化差异较大，可替换为目标语中功能相近的意象；若保留意象会妨碍理解，则可进行释义或去隐喻化。在政治话语翻译中，任东升、季秀妹提出的“政

治等效”原则也提醒我们，隐喻翻译不能只看修辞形象是否保留，更要看国家立场、政策意图和传播功能是否得到有效传达^[12]。

“压舱石”属于较适合保留的共享隐喻。白皮书将其译为“the ‘ballast stone’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ballast”在英语中同样具有“保持稳定、防止倾覆”的语义联想，因此该译法能够把粮食安全作为国家稳定基础的含义直观呈现出来。与完全意译为“a stabilizing factor”相比，“ballast stone”保留了原文的形象性和修辞力度，使国际受众既能理解其功能含义，也能感受到中国政治话语中常用的形象化表达方式。其局限在于，“ballast stone”在英语中的固定程度不如汉语“压舱石”高，若脱离上下文可能显得略微陌生。因此，引号的使用实际上起到了提示作用，既保留了文化可见性，又降低了理解风险。

“命根子”的翻译则更适合采用替换意象。以“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为例，译为“farmland is the lifeblood of grain production”比直译为“the root of life”或“the life root”更自然。“命根子”在汉语中带有口语化和乡土化色彩，强调不可失去、不可动摇的生命基础；英语中的“lifeblood”同样能够表达维系生存和运行的关键资源。该译法没有保留“根子”的表层形象，却保留了“生命依托”的语义强度，从功能对等角度看更有利于目标语接受。这里的意义转换并非削弱，而是一种文化补偿：译文用英语中更熟悉的隐喻资源补偿了汉语乡土隐喻可能带来的陌生感。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则属于需要部分去隐喻化的中国特色政策表达。若仅译为“rice bag responsibility system”，英语读者难以判断其指向的是家庭储粮、市场供应还是行政责任。译为“the system of provincial governors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ice bag’ (grain supply)”时，译文保留“rice bag”这一生活化意象，同时用括注“grain supply”显化其政策所指。这种处理把隐喻保留与去隐喻化结合起来，既维持了中国政治话语的文化特征，也避免了制度信息模糊。类似地，“端牢中国饭碗”若直接译为“hold China’s rice bowl firmly”，能够保留文化意象；但在正式外宣文本中，若面对不熟悉该隐喻的受众，也可处理为“ensure that China’s food supply remains firmly in its own hands”，将“饭碗”背后的自主供给和安全保障意义显化出来。

由此可见，隐喻翻译的策略选择取决于意象的跨文化共享程度和政治信息的清晰度。保留意象有助于增强中国话语的文化辨识度，但可能增加理解门槛；替换意象有助于实现目标语中的修辞自然，却可能降低原文文化色彩；去隐喻化能够提高政策信息的透明度，但也可能使译文失去形象性。因此，译者应根据具体语境判断隐喻的核心功能。如果隐喻

主要服务于制度说明，应优先确保意义清晰；如果隐喻承载明显的文化表征，则应尽量通过括注、解释性增补或目标语等效意象进行文化补偿。

3.4 隐性逻辑下的无主句和流水句：增译主语与句法重构

前文关于句法特征的分析表明，“粮食安全”政治文本常采用无主句、连动结构和流水句，将政策目标、行动路径和结果评价压缩在连续语义链中。这种表达与汉语重意合、重语境的组织方式密切相关。连淑能指出，汉语常依靠语序和语义关系实现句际衔接，而英语更依赖主语、连接词和形式标记来组织逻辑。Hall & Hal 关于高语境交际的论述也说明，中文政治文本中的许多逻辑关系可以由共享政治语境补足，但英语受众往往需要更明确的形式提示。因此，英译无主句和流水句时，关键并不是简单拆句，而是通过增译主语、显化逻辑关系和重构句法层级，使译文获得英语文本所要求的责任主体和逻辑秩序。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善粮食生产收储加工体系，多措并举抓好农业生产”译为“Steps were taken to improve the system for grain production, purchasing, storage, and processing, and multiple measures were adopted to ensur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原文没有明示施事主体，读者可根据政治文本语境理解为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行动。译文使用“Steps were taken”和“multiple measures were adopted”的被动结构，既补足了英语句法所需的主语，又避免过度突出具体部门，从而保持政府工作报告中客观、正式的叙述语气。这一策略解决了汉语无主句在英语中可能造成的句法不完整问题，同时也保留了政治文本强调政策行动和治理结果的表达重心。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译为“We will ensure the production of grain and other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make solid progress in the new drive to increase grain output by 50 million metric tons”。此处译文增补“We will”，明确政府作为行动主体，使承诺性和计划性更加突出。同时，译文将“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重构为“the new drive to increase grain output by 50 million metric tons”，把中文政策表述中隐含的数量意义转换为国际通行的公制单位表达。这一转换不只是单位换算，更是面向国际受众的传播适配：如果保留“one hundred billion jin”，读者需要额外理解中国计量单位，信息接受效率会明显降低。

从理论上讲，这类处理属于结构转换和逻辑显化。Catford 所说的结构性转换强调，翻译中常因两种语言的语法系统差异而需要调整语序、结构和语法单位。贾毓玲在谈中央文献翻译时也指出^[13]，政治文献英译必须处理好汉语行文

中省略、并列和逻辑隐含的问题。具体到“粮食安全”话语，增译主语能够补足责任主体，连接词和介词短语能够显化目的、手段和结果关系，长句拆分或主从重组能够避免英语译文出现动词堆叠。其局限在于，逻辑显化过度可能使译文显得解释性过强，削弱原文的凝练性。因此，译者应把握一个尺度：凡影响目标读者理解政策责任和行动关系的逻辑，应当显化；凡英语可通过语境自然推断的内容，则不宜过度补写。

3.5 强化语势的排比与重复结构：省译动词与合译并列项

排比与重复是中国政治语篇常用的语势强化手段。在“粮食安全”话语中，重复结构能够突出政策部署的全面性和连续性，也能形成政治宣示的力量感。但英语政策文本通常不追求密集重复，而更重视表达的简洁、信息层级和逻辑清楚。Baker指出^[4]，翻译中的省略并不必然意味着意义损失，只要省略的是目标语中可由语境恢复或重复度过高的成分，译文仍可保持信息完整。由此，排比重复结构的英译可采用省译动词、合译并列项和结构压缩等方式，将中文的语势优势转换为英语的清晰优势。

例如，白皮书中的“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被译为“a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system at a very high level characterized by quality,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原文连续使用四个“更”字，形成层层推进的评价语势。若逐一译为“a higher-level, higher-quality,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system”，英语形式上虽接近原文，却显得重复冗长。现有译文将“更高层次”处理为“at a very high level”，再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压缩为“quality,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保留了评价维度，却避免了比较级反复堆叠。这里的省译并没有删去核心意义，而是把原文的修辞强化转换为英语中更自然的概念并列。

又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善粮食生产收储加工体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译为“improve the systems for grain production, storage, and processing and take comprehensive step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food security”。原文中“完善”和“夯实”形成对称动作，“体系”和“根基”形成语义呼应，体现政策推进的力度。译文没有机械复制这种对称，而是将前半句处理为“improve the systems”，后半句处理为“take comprehensive step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形成英语中自然的“制度建设—基础巩固”逻辑链。“全方位”译为“comprehensive”，也比“in an all-round way”更简洁自然，避免了外宣译文中常见的中式英语痕迹。

需要指出的是，压缩重复并不等于弱化政治语气。对于

政治文本而言，语势既可以通过重复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准确的动词、清晰的层级和紧凑的结构来实现。黄友义提出外宣翻译应坚持贴近中国发展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思维习惯^[5]，这一原则说明，译者不能只从中文修辞习惯出发保留排比形式，还要考虑英语读者的接受方式。排比重复的适用条件是：当重复本身构成政策结构或意义层级时，应适度保留；当重复主要起强调作用且英语中容易显得累赘时，应通过合译和省译提高表达效率。其可能的意义弱化可通过选择力度较强的动词，如“consolidate”“ensure”“guarantee”“strengthen”等进行补偿。

3.6 互文性视角下的引经据典与俗语：阐释性意译与文化补偿

“粮食安全”话语中的典故和俗语，是最能体现农耕文明和民本思想的文化表征形式。它们通过引用古典文献、民间经验和历史语汇，把当代粮食政策置于更长时段的文明叙事之中。Venuti指出，翻译与互文性密切相关，译者需要处理文本背后的文化记忆和价值系统^[6]。对于外宣政治文本而言，典故和俗语的翻译既不能完全抹去文化来源，也不能为了保留文化形式而牺牲理解效果。因此，较为可行的路径是阐释性意译与文化补偿相结合：在目标语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保留文化意象；当意象过于陌生时，则通过解释性表达把深层含义传递出来。

白皮书中“民为国基，谷为民命”译为“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 food is the primary need of the people”。原文具有古典格言式的凝练结构，“民”“国”“谷”“命”四个关键词构成了民本政治和农耕文明的核心链条。译文没有把“谷”直译为“grain”，而是译为“food”，这是为了把古代语境中的“谷”转换为现代受众更容易理解的基本食物概念；“民命”也没有直译为“the life of the people”，而是处理为“the primary need of the people”，避免了英语表达的生硬。该译法在形式上弱化了原文的古典韵味，但在功能上保留了“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食物为基础”的价值逻辑，属于典型的文化补偿。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常译为“As long as we have food in our hands, we will never panic”或“Having grain in hand gives us peace of mind”。这句俗语来自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表达的是粮食储备带来的心理安全感。若逐词保留“hand”和“panic”，译文可以较好传递口语化色彩，但可能显得略直白；若译为“gives us peace of mind”，则更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也更能传达心理稳定感。二者的差异说明，俗语翻译需要根据语篇功能选择策略：如果强调中国民间表达的原貌，可适度保留直译；如果强调政策文本的正式传播效果，则可

采用更自然的意译。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核心都应是让国际受众理解粮食安全不仅关系物质供给,也关系社会心理稳定。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译为“Only when the granary is full will people learn etiquette; only when people are well-fed and clothed will they know honor and shame”。这一译法较好地保留了“granary”这一农耕意象,同时借助“Only when...”结构显化了原文中“物质基础—社会伦理”的因果关系。这里的关键不在于逐词解释“礼节”和“荣辱”的传统伦理内涵,而在于说明中国政治话语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治理逻辑:民生保障是社会秩序和道德建设的基础。译文通过句法显化补足了汉语古典句式隐含的逻辑关系,使文化典故不再只是装饰性引用,而成为理解中国粮食安全理念的重要入口。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译为“*As an ancient Chinese saying goes, 'Of the eight 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the state, food is the most important.'*”此句出自中国古代政治经典,若在正文中过度解释“洪范”的文献背景,会增加理解负担。译文通过“*As an ancient Chinese saying goes*”提示其文化来源,再将“八政”阐释为“the eight 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the state”,将“食为政首”处理为“food is the most important”,实现了文化提示与意义简化的结合。其不足在于,原文所包含的经典权威感和历史厚度有所弱化;但这种弱化换来了目标语读者的顺畅理解,是外宣语境中可以接受的取舍。

综上,互文性表达的英译应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完全直译,导致典故变成难懂的文化符号;二是完全去文化化,使中国政治话语失去历史纵深。较好的做法是坚持“意义优先、文化可见、表达自然”的原则。对于“谷”“仓廩”“饭碗”等能够承载中国农耕文明记忆的意象,可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保留;对于“洪范”“八政”等目标语读者较难直接理解的文化符号,则应通过概括性提示和阐释性意译传递核心意义。这样才能使“粮食安全”英译既准确传达政策信息,又展示中国政治话语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治理理念。

总体而言,基于文化表征的“粮食安全”英译不是把某一种翻译方法固定套用于所有表达,而是根据不同语言形式所承载的文化功能进行策略选择。政策术语强调权威性和稳定性,适合直译与释译显化;四字格和对偶结构强调节奏与概括,适合词性转译和句法整合;隐喻表达强调形象与文化识别,适合保留、替换或去隐喻化的分层处理;无主句和流水句体现高语境意合逻辑,适合增译主语和显化逻辑;排比重复结构强调语势,适合省译动词与合译并列项;典故俗语承载互文文化记忆,适合阐释性意译与文化补偿。这一策略体系回应了本文前两章关于语言特征和文化表征的分析,也说明外宣翻译的核心并非简单追求字面忠实,而是在跨文化

传播中重构政治意义、文化意象和受众理解之间的动态平衡。

4 结语

本文以《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及其它政治文本为主要语料,考察了“粮食安全”话语的语言特征、文化表征及其英译策略。研究表明,这一话语并非单一农业术语,而是兼具国家安全、民生保障、制度叙事与国际传播等多重功能的复合型政治话语。语言上,它呈现了术语化、四字化、隐喻和意合等特点。文化上,它交织了农耕文明记忆、民本价值传统、高语境思维与新时代制度叙事。据此,本文认为,“粮食安全”英译的关键不在机械字面对应,而在于根据不同表达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翻译处理:术语以稳定和权威为先,四字结构重在逻辑重组,隐喻表达讲求意象取舍,无主句和流水句重在主语补足与逻辑显化,排比重复结构采用省译动词与合译并列项,典故俗语则需要阐释性意译与文化补偿。换言之,外宣翻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怎么译”的技术问题,更是“为何如此译”的传播问题。

当然,本文也有局限:语料主要限于白皮书和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类型不够丰富;研究重点仍在文本层面的策略归纳与例证分析,对海外受众接受效果和译文传播反馈关注不足。后续可进一步扩大语料范围,将外交发言、国际媒体转载文本及多模态传播材料纳入分析,并结合语料库方法与接受研究,检验不同译法在国际传播中的实际效果。总体而言,“粮食安全”话语的英译,本质上是中国国家叙事、文化传统与治理理念的跨文化再表达;只有充分把握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政治功能,才能真正实现从“可译”到“善译”、从“信息传递”到“有效传播”的提升,进而为提升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实践参照。

[参考文献]

- [1]朱义华,张健.学科视野下的外宣翻译之“名”与“实”探究[J].上海翻译,2021(5):34-38.
- [2]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
- [3]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4]隋斌.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演进、思想理念及对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23(11):2-17.
- [5]岳翔宇,夏艳秋.国家治理与粮食安全:基于中国传统荒政思想的考察[J].财经研究,2023,49(10):154-168.
- [6]Hall, E. T. & M. R. Hall.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M].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1990.
- [7]顾忆青,吴赞.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评述与展望[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2(1):11

3-124.

[8]Schäffner, C.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nslation Studies[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004, 3(1): 117-150.

[9]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0]张健. 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宣翻译“变通”策略刍议[J]. 外国语言文学, 2013,30(1):19-27,43.

[11]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88.

[12]任东升,季秀妹. 基于“政治等效”的外交话语隐喻英译策略——以2019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为例[J]. 当

代外语研究,2021,21(3):84-95.

[13]贾毓玲. 对中央文献翻译的几点思考[J]. 中国翻译.2011.32(1):78-81.

[14]Baker, M.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 2nd ed.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5]黄友义.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 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 中国翻译,2004,25(6):29-30.

[16]Venuti, L. Translation, Intertextuality, Interpretation[J]. Romance Studies, 2009, 27(3): 157-173.

作者简介:

钟洁玲(2002.02-), 女, 汉族, 湖南长沙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